

省港大罢工与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成熟 ——以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指导为视角

■ 万 玲

一

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中工人运动的理论指导

(一)指出了东方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领导民主革命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并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条件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并为列宁所继承和发展的策略原则。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在于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为“无产阶级赢得国家政权,并且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政权做好准备”。^[1]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罗易着重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工人阶级必须准备在紧急关头把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接收过来。”他认为,工农群众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进程中,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同资产阶级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在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东方各国少数先进工作者代表们应当找到这种十分正确的、完全合适的解决办法,以便使以日本的年轻工人阶级为一方和以遭受日本压迫的那些国家的亿万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行动取得真正充分的协调一致。”

总之,共产国际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必须认识到:“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彻底胜利是同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势不两

立的。因而这个革命的客观任务也就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2]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方面仍然要保持民族解放运动中工人运动的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哪怕是暂时的妥协。

(二)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

在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拉狄克指出:中共应该组织工人阶级,并“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以共同进行反帝斗争。^[3]维经斯基提出“中国工人阶级正开始步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最前列”和“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他希望中共能够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努力把中共建设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坚持共产党的独立面貌与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大会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规定:“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4]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维经斯基在发言中强调了三点:第一,必须要求共产党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第二,共产党应该注重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开展工会工作;第三,共产党应该利用各团体之间的矛盾来发展自己。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许勒尔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人运动,随着它的形成,必将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因素。”^[5]他极力主张中共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人运动,加速自身组织的发展,建立群众性共产党。

1924年6月,共产国际五大召开,作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之一的中国革命问题受到大会的重视。大会“号召中国共产党和同情它的国民党

以全部精力为伟大的事业继续顽强的斗争,解放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使他们摆脱野蛮而又残酷的资本主义压迫”。

上述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必须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高度重视。

(三)中共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思想的提出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5个月以来的成绩,指出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认为只有发动“工人阶级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批评了前一段“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错误,并制定了加强党的工作的具体措施。^[6]

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讨论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中国的民族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7]着重指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8]

上述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

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的高度重视

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以其领导之坚强、组织之严密、规模之巨大、时间之长久、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密不可分的。共产国际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斗争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及时提出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

(一)鲍罗廷对罢工的悉心帮助与指导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

上海,无法第一时间判断广东的形势,因此,广东区委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在广东区委领导罢工的过程中,鲍罗廷给予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第一,针对邓中夏、陈延年提出的罢工委员会中存在的问题,鲍罗廷建议“除了已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之外,再组织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使工人群众明了真相”。“省港大罢工的重要决策无一不是同鲍顾问商量过的,多数是他提出来的。”^[9]第二,为了结束罢工,拟定谈判的具体方案。鲍罗廷认为,赔偿问题是解决罢工的主要问题。第三,提出结束罢工的具体方案。鲍罗廷为此拟定了计划:“将罢工工人分成若干组,以便每月可以遣散一个或更多的组,付给每个组一定数目的钱,使他们有可能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安顿下来。这笔费用将从进出口的特别税中获得。”^[10]

(二)布勃诺夫使团“取消罢工方针”的提出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结束罢工以稳固革命后方乃成为大势所趋。1926年3月中旬,布勃诺夫使团到达广州。根据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目前应该采取取消罢工的方针”^[11]的结论。布勃诺夫在结论中指出,使团不怀疑罢工给国民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好处,不怀疑罢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广州对于香港的独立,使广州在经济上得到加强,从而帮助国民政府真正地站立起来。但“罢工拖得太久了,已经拖到如此地步,以致再拖下去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严重的威胁”^[12]。3月27日,布勃诺夫在汕头给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必须尽量顺利地结束省港大罢工”^[13]。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正是遵循这一意见来推动省港大罢工的解决。

(三)远东局使团与结束罢工决定的形成

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遣了一个以维经斯基为首的使团,于6月到达上海。7月初,使团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对省港大罢工得出了以下结论:“立即停止香港罢工,不提出香港不能接受的大量物质赔偿要求。”^[14]8月,维经斯基率远东局使团前往广州。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使团坚信罢工的拖延解决“使广州的整个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了,进而又使社会政治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15]。同月底,远东局使团、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会议,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有必

要在不要求香港给予货币赔偿情况下结束罢工,在这方面应当进行整个准备工作。”^[16]10月,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停止封锁发表宣言,中共广东区委也发表《为省港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这样,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终于宣告结束。省港罢工的顺利结束,不仅稳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行。

在1926年2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上,省港大罢工得到共产国际的好评,认为它“已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并加入了阶级工会组织的中国工人阶级已成为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已成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争取建立人民政权的首倡者和主要战士”。^[17]

三

苏兆征在省港大罢工中的核心作用

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至1926年10月结束,历时16个月之久。它不仅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且在国际职工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壮举。苏兆征作为罢工委员会主席,是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对这次反帝斗争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苏兆征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充分的准备工作

早在1921年,苏兆征参与建立中国海员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2年,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一起领导发动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从而“成为全国海员的中心领导者”。这次历时56天的大罢工的胜利,成为中共领导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标志。此后,苏兆征积极支持配合中共广东区委的活动。1925年春,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苏兆征负责筹备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顺利召开,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30个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为工会组织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苏兆征作为这些议案具体起草人和负责人,其贡献不言而喻。

1925年6月,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邓中夏提出了发动省港罢工的意见,并分析了这次罢工的意义与可能性。广东区委听取了邓中夏的

意见,但为稳妥起见,决定先派邓中夏、杨殷、杨匏安、孙云鹏等人前往香港与苏兆征等人会合,一起研究罢工组织发动工作等问题,并视情况决定是否举行罢工。邓中夏等与苏兆征会合后,即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可以说,整个罢工的准备工作都是由苏兆征和邓中夏进行的。在得到中共中央广东区委决定发动省港罢工的指示后,苏兆征与邓中夏等人认真研究,制定行动方案。其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要在香港发动全香港几十万工人罢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为此,苏兆征充分利用他在香港工人中的影响力,在香港工人中宣传动员,推动罢工工作的开展。尽管罢工组织工作受到一些阻力和干扰,但在苏兆征的领导下最终得以排除。

(二)苏兆征是省港大罢工的核心领导

1925年6月19日,苏兆征领导香港海员工人率先举行反帝罢工斗争,省港大罢工正式开始。这次省港大罢工的发动与举行,苏兆征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邓中夏曾有评价:“以我们的主观力量估计起来,罢工万难实现。然而不到两个星期,居然实现了罢工。其主要原因,固然革命高潮所逼近,这座火山只需一点导火线,便可爆炸;然而亦因苏兆征同志平常对于各工会领袖有一种吸引力,故终能使黄色工会与行会工会一致赞成这次最大的罢工。”^[18]

7月3日,作为领导这次罢工的最高领导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苏兆征被选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罢工委员会在省港大罢工中真正发挥着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7月31日,苏兆征为了加快罢工进程,草拟了7条工作计划:“一、武装封锁开口计划;二、扩大近海口宣传计划;三、全部筹款计划;四、筑路及一切建设事业问题;五、特别开支问题;六、粮食燃料开货仓之具体标准;七、特别法庭问题”。作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与邓中夏、李森等领导人一道,始终戮力同心,沉着刚毅,负重致远,坚定不移地联合各阶层人士,带领全体罢工工人坚持斗争。据统计,从1925年8月20日至1925年底4个月内,苏兆征共主持召开或参加了10次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议、14次联合联欢会。在领导省港大罢工过程中,苏兆征就是这样不顾

疲劳、全力以赴地捍卫广大罢工工人的利益。“为工友们谋福利,为工人群众尽忠服务,成为兆征同志工作活动的最大特色与目的。工人群众之始终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可知并非偶然!”^[19]

四

省港大罢工与苏兆征工人运动思想的成熟

苏兆征是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从自发组织海员工人进行罢工,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负责领导工人运动,他“自始至终,坚定不移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意志而奋斗”。刘少奇称赞他是有“很长久的革命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的工人领袖。

(一)注重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苏兆征注重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作为一名党员,他一贯严守党的纪律,自“加入共产党的第一天,便过党团的生活,完全依照党的政策去活动”,“在省港罢工中,国民政府中,以及在一切活动中,都无不如此”。他在罢工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具有阶级觉悟、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在参与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中,有近千名先进分子先后入党,其中包括邓发等一批在党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党员干部。他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努力推动海员工人中的共产党员成立党支部,作为领导海员工人开展革命活动的核心力量。

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苏兆征注重深入群众,发动和团结群众共同斗争。他对群众“竭尽智慧去开导他们”。香港海员大罢工酝酿期间,为揭露资本家的险恶用心,他深入海员住地,在“泽生”号上展开细致有效的宣传动员工作。他深知工人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强调:“凡我海员,遵守停工规则,万众一心,风虎云龙,获收效果,庶乎有期。”后来,当罢工命令正式下达时,“‘泽生’号的工人兄弟是第一个罢下来的”。他注重征求群众意见,尊重并发扬工人群众的民主和首创精神。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努力整顿会务,提出了工人监督职员的办法,使每个工人都能过问工会会务,“实开工会民主化

之先河!”

(二)注重实行正确的政策策略

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苏兆征注重实行正确的政策策略。省港大罢工初期,曾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随着形势发展,苏兆征等同志发现这种四面出击的做法,忽视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将其他国家赶到反对罢工的英国一方,遂改变策略,决定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制定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单独对英”的“中心斗争策略”,从而有效拆解帝国主义的联合,并争取到各方同情支持。他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亲切接待国外友好人士,向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介绍罢工情况,收到良好效果,有力地促进了斗争形势的发展。

(三)注重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武装建设

苏兆征一贯注重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建设,尤其是工人武装力量的建设。省港大罢工中,工人纠察队的组建,以工人纠察队作为维护罢工运动的武装力量是一项重要的建树。这支工人武装实际上是由党组织领导的。苏兆征高度重视这支队伍的建立和发展。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纠察队仿照军队模式编制,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不但为省港大罢工作出重大贡献,还在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南征以及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北伐进军时,即有相当一批纠察队员加入其中并立下赫赫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作为党的重要领导成员,苏兆征积极领导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不但参与制定实施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还直接参与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的筹划和领导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探索工人运动中的监察工作

苏兆征在党的监察工作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省港大罢工期间,他注重将罢工委员会的机构建设与工作人员的廉洁放在重要位置。当时,随着斗争的持久开展,罢工委员会所处理的财物数量不断增加。为破坏罢工,有人肆意诽谤苏兆征等贪污受贿,图谋夺取罢工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保证领导机构及成员的清正廉洁,进而确保资金安全以及调配使用合理,成为

赢得工友信任、稳定罢工队伍、确保斗争胜利的关键一环。为此,省港罢工委员会严格建立各项监察机制,不断加强各方面监督,其中包括:成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按罢工工人的人数进行普选,作为最高议事机关;工人代表接受群众委托,将群众意见带到大会,会后则将决议向群众汇报;罢工委员会各项工作。以及各负责人任命和财政收支等情况都须向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汇报;号召工人以主人翁精神,对委员会进行积极监督,及时发现问题,迅速清除污垢。这些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但有力地保证了大罢工向前推进,而且在党的监察事业发展中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五)积极致力于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苏兆征还积极致力于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1927年5月,他参加筹备在汉口举行的太平洋劳动会议,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会议。1928年2月,他主持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向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会代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介绍中国工人阶级坚持反抗斗争的情况和经验。3月,他到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其后,他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苏兆征成为国际职工运动中的著名活动家。正如邓中夏所评价的:“兆征同志是由不断斗争中,由群众运动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是海员的领袖,他是香港与广东劳动群众的领袖,他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之一,他是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注释:

-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 [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355页。
-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

- 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63页。
-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24页。
-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4页。
-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页。
-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 [9]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
-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
-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8页。
-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467页。
-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4页。
- [17](匈牙利)贝拉·库恩:《文件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59页。
- [18]卢权、裨倩红著:《苏兆征》,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 [19]卢权、裨倩红著:《苏兆征》,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作者系湖北省武汉革命博物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